

清代《王制》研究及其成篇年代考

王 鐸*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礼记·王制》的作者和成篇年代,自汉以来,说法不一。清末,廖平、康有为等人认为,《王制》是“孔子改制之作”,故《王制》备受晚清学者重视。分析诸家观点和《王制》的内容,并将《王制》与《孟子》、《荀子》等文献进行比较,《王制》经文部分盖写成于战国中期,与郭店楚简的写作年代大致相当。刘向以前,经文部分和后面解释性文字已经抄写在一起,成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样子。

关键词:清代;礼记;王制;成篇年代;考辨

中图分类号:K22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1-0019-07

有清一代,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盛,经学研究异常繁荣,清代学者,不仅遍注群经,对每一经书中的个别单篇,也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就《礼记》而言,据笔者统计,清人研究《礼记》的专书就有250多部^[1]。对《礼记·王制》的研究,由于廖平、康有为等人“素王改制”之说的盛行,成绩突出,对近代经学、思想文化及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王制》究竟是何人所作?产生于什么时期?成为清代今文经学家门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先对清代《王制》研究做一概述,然后主要考察《王制》成篇的年代问题。

一、清代《王制》研究概述

清代《王制》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在对《礼记》进行全面笺注的同时,对《王制》也进行经文的训释和相关礼制的阐释,代表作品主要有王夫之《礼记章句》49卷、纳喇成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38卷、张廷玉等《日讲礼记解义》64卷、方苞《礼记析疑》46卷、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100卷、孙希旦《礼记集解》61卷、朱彬《礼记训纂》49卷、金曰追《礼记经注疏正讹》63卷、王闿运《礼记笺》46卷等。这一类著作以孙希旦《礼记集解》和朱彬《礼记训纂》最佳而有代表性。孙希旦和朱彬都主张《王制》是汉文帝时博士所作,即同意卢植的说法^[2]。

另一类是对《王制》单篇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除训解经文和阐释礼制外,重在发挥其“微言大义”。代表作品有廖平《今古学考》2卷、《王制学凡例》1卷、《王制订》1卷、《王制集说》1卷和皮锡瑞《王制笺》1卷与康有为《王制义证》、《王制伪证》、《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及相关论著。

经学今、古文之争起于汉代,自郑玄遍注群经以后,经学今、古之界限逐渐泯灭。清代随着汉学的昌盛,经学今、古之辨亦渐起。学者虽然以今、古文互相论争,但对于今、古文之间立异的根源所在,未能明确。汉代今、古文之异不在文字和义理,而在于礼制。这就是廖平的经学观点,这种观点主要体现于1886年写成的代表作《今古学考》一书^{[3][①]}。此书之宗旨是“今学主《王制》,古学主《周礼》”。今文经学祖孔子,主改制,是经学;古文经学祖周公,主从周,是史学。今、古两派皆源于孔子,今文经学是孔子晚年之说,古文经学是孔子少壮之说,二者不可偏废。这一主张,对学术界影响至大且巨,几乎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仅康有为、皮锡瑞等今文经学者据以为说,即古文经学家若刘师培、章太炎等人也

收稿日期:2005-07-15

作者简介:王鐸(1965—),男,甘肃甘谷人,文学博士,南京师大文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献学及“三礼”研究。

① 李学勤先生在《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一文中,对《今古学考》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分析,对廖平今、古文分派之说的依据之作《五经异义》也进行了评判,《五经异义》评述礼制,是今、古兼采,并非互不混淆。最后总结说:“仔细研究许慎《五经异义》,结果与廖平《今古学考》的学说不是一致的。这就促使我们感到,有必要重新考虑汉代经学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观点。当时的几种古文经学说未必全然共通,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所论更非‘道一风同’。改变自《今古学考》以来普遍流行的今、古两派观点,对于经学史及有关方面的研究是一件大事。”李学勤先生的分析,深刻而精辟,启发我们对经学史上的许多问题重新思考,以古文献本身为基础,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尽量做出实事求是的评判。

持以为据^①。

对于《王制》，廖平在《今古学考》卷下《经话》说：

孔子初年问礼，有‘从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于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补偏；于是以心所欲为者，书之《王制》，寓之《春秋》，当时名流莫不同此议论，所谓因革继周之事也。后来传经弟子因为孔子手订之文，专学此派，同祖《王制》。其实孔子一人之言，前后不同。予谓从周为孔子少壮之学，因革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知今学同祖《王制》，万变不能离宗；《戴礼》今、古杂有，非一家之说；今、古不当以立学不立学为断；古学主《周礼》，隐与今学为敌；今礼少，古礼多；今礼所异皆改古礼等说，则西汉大儒均不识此义矣，何论许、郑乎！……群经之中，古多于今，然所以能定其为今学派者，全据《王制》为断。……《王制》即所谓继周之王也。……《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胜之弊，因其偏胜，知其救药也。年岁不同，议论遂异。春秋时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为今学之本旨。何君解今礼，以为《春秋》有改制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

《王制》经廖平这样一说，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划分经今、古学的代表性作品，《王制》不仅是孔子“挽弊补偏”改制之作，也成为今文经学之祖。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廖平又写成《王制集说》、《王制订》等著作，进一步阐发“孔子改制”之说。后又撰《知圣篇》和《古学考》（即《辟刘篇》），阐发“尊今抑古”的思想。

1889年，廖平至广州，与康有为面谈。康有为深受廖平启发，尽弃前说，信奉今文经学，先后有《王制义证》、《王制伪证》、《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问世，尤其是后二书，风靡全国，影响一代学风，今、古文分派之说也深入人心。康有为认为：“《王制》者，盖孔子将修《春秋》，损益《周礼》而作。王者，谓素王；王制者，素王改制之义。……汉世政事，昔用孔法，至今两千年，士夫无世官，郡国兴科举，皆出《王制》之礼^[4]。”

其实，俞樾早就认为《王制》是素王改制之说。廖平《今古学考》说：“俞荫甫先生以《王制》为《公羊》礼，其说是也。”皮锡瑞据俞樾之说，撰《王制笺》1卷，谓《王制》乃素王之制。

《王制》是“孔子改制之作”的观点，经廖平、皮锡瑞尤其是康有为的论述宣传，成为近代经学中最有影响的观点之一。那么，《王制》究竟是成篇于何时呢？这就需要对历代学者的观点和《王制》的主旨作一考察。

二、《王制》成篇年代“观点”综说

关于《王制》的成篇年代，历代学者说法不一，除上所述外，主要有以下几家：

1、司马迁认为，《王制》作于汉文帝前元十六年（前164）。《史记·封禅书》曰：“（前164年）夏四月，文帝……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索隐》曰：“刘向《七录》云，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篇^[5]。”

2、卢植曰：“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6] [P. 330]。”

3、郑玄曰：“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P. 33.]。”

4、孔颖达曰：“《王制》之作，盖在秦汉之际。知者，案下文云‘有正听之’，郑云‘汉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语，则知是周亡之后也^[P. 330]。”

5、任铭善曰：“《王制》何为而作也？《王制》作于战国之末纪。于时国异教，家异法，君僭号，臣僭礼，乱政亟行，权术方兴，盖《书》缺《诗》亡，礼崩乐坏，《春秋》之教弛而王者之迹息矣。其为士者忧之，于是各以其道治，舍短取长，著为文章。……忧天下者则尤惧夫王政之不可见，而其言亦浸以不闻也，遂因孟子之义，参比六经，通万方之略，以成儒者一家之说，征虞夏殷周而立一王之法，而朝聘之制且兼及晋文之霸，其政不烦，君子亦有取焉。是则《王制》之篇所由作也^[7] [P. 6-7]。”任铭善先生观点，与郑玄的观点相同；钱玄先生同意郑玄的观点^[8] [P. 243-244]。

6、沈文倬先生说：“《王制》篇应属秦、汉间人论述前代爵禄、学校、选举、养老等制度的作品。”“《王制》是秦、汉间人所作^[9] [P. 3]。”

①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中蒙默先生之《今古学考》说明。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下引《今古学考》之文，皆出此书，再不出注。

对于司马迁、卢植、孔颖达等人的观点，任铭善先生早有辨证。他说：

卢君盖据《史记》言汉文帝令博士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封禅巡守事。然其言在《封禅书》，则文帝所作《王制》宜重其事，其遗文或有见于《封禅书》及《白虎通》者，而此篇曾无一字及之；司马贞《索隐》引《别录》，更谓文帝书有《本制》、《兵制》、《服制》诸篇，此篇亦无其文；则此《王制》非文帝《王制》至明。……《疏》说未可信。^①“正听”之“正”，古有其官。郑君云“正于周乡师之属”者，《周官·乡师》云：“掌其戒令纠禁，听其狱讼。”而司徒之官有党正，掌戒禁校比之役。又《仪礼》乐正、小臣正、仆人正、大射正、司正，《周官》宫正、酒正，诸注皆以“长”训“正”。《尔雅·释诂》亦云：“正，长也。”则此“正”不必秦汉“正平”之官；而《王制》与《周官》异撰，亦不必于《秋官·司寇》中傅会之也。至于“古者以周尺”、“今以周尺”等语，则以文理观之，固是汉人增益注释之辞。古者百亩百里，当今若干，正为读《王制》者明前文方一里、方十里、方百里、方千里当汉制之大小，果为汉人所作，何不径取汉制，又安劳复加注明哉？且自“古者周尺”以下，即就前文以推其封建禄食之多寡，又列六礼、七教、八政之目，以释“司徒修六礼明七教齐八政”之文，斯知“古者周尺”以下为汉人语，固本文为之附益，犹《礼经》篇末之有记也。又何得据以定是篇之出于汉人哉？《郑志》答临硕曰：“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案郑注《礼记》甚早，其于《王制》多以为殷代法；晚年答临硕之问，乃谓其本之《孟子》。知其必在《孟子》后者，以孟子论周室班爵禄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苟先有《王制》之文，则北宫锜不必问，而孟子无容不闻其详也。故知《王制》据《孟子》而在《孟子》后，其言班爵禄有不同于《孟子》，及税征学养诸节详略异文，则又为《王制》者所损益参酌也。盖当以《郑志》之说为定^[P. 11-12]。

任铭善的观点可以总结为：

- 6.1、汉文帝令博士所作《王制》非《礼记·王制》；
- 6.2、正者，长也。先秦早有宫正、大射正等官；
- 6.3、“古者以周尺”以下，是汉人注释前面文字之辞，类《仪礼》之“记”；
- 6.4、他同意郑玄的说法，认为《礼记·王制》作于《孟子》后，约战国末纪；
- 6.5、若《礼记·王制》作于《孟子》前，则北宫锜没有必要向孟子请教爵禄之制。

任铭善先生的前三点结论非常精到，但后两点尚可商榷。就是当时有专门记载周朝官爵和俸禄等级制度的类似《礼记·王制》的文献，北宫锜不一定看到，故向孟子请教，这很正常，并不能作为《王制》成篇于《孟子》后的证据。至于成篇于战国末纪的观点，证据也不足。沈文倬先生的观点，基本与司马迁等人的观点相同。

三、《王制》篇名释义、内容与《荀子·王制》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有必要看看《王制》的主要内容。

《王制》是以首章首句是“王者之制禄爵”，故名“王制”。郑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记先王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法度，此于《别录》属制度^[P. 330]。”郑玄说非也。

《王制》计4339字^{[10][P. 1351]}，主要记录了以周朝为主的爵禄、封国、官职、巡守、祭祀、养老等制度。任铭善云：“兹篇所记者十事：班爵、禄田、任官、巡狩、朝聘、教学、养老、国用、丧祭、职方，盖损益四代以定一王之法，而未必时行者也^[P. 11]。”任说近是。仔细研读《王制》，内容大概可分为五部分。

一是爵禄制度。天子为臣下制定爵位和俸禄。天子臣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诸侯臣下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五等。天子的禄田是一千里见方，子、男是五十里见方，不足五十里见方的小诸侯，不朝见天子，隶属于较大的诸侯，叫“附庸”。天子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卿、大夫、上士的禄田分别比照公侯、伯、子男和附庸。

每个农户受田一百亩。百亩之田按土质肥瘠分为五等，百亩之田的一个农夫按土地肥瘠可分别养活九口至五口之家。平民在官府当差者，参照此等差执行。各等诸侯的卿、大夫、士的俸禄田按照一定等差执行。

天子的官属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中、小诸侯国的官属分别有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国三卿由天子直接任命，中、小诸侯国分别有二卿和一卿由天子直接任

① 指前4所引孔颖达之语。

命，其余由国君任命。

二是封国制度。四海之内分为九州。每州面积千里见方。每州分封有210个诸侯国，其中百里见方的30个，七十里见方的60个，五十里见方的120个。天子直辖的王畿分封给公卿大夫，方百里者9国，方七十里者21国，方五十里者63国，计93国。九州共计1773个诸侯国。

天子任命其大夫做三监，每州派三个大夫，代表天子去监察方伯。王畿内分给公卿的土地叫禄田，活时享用，死后归还。王畿外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可以世袭。

根据规定，天子的三公八命，再加一命成九命，则可以穿衮服。命即天子擢升臣下的册命，命数越多，爵位越高，礼服上的图案也越多。衮服是上公的礼服，图案有九种：一龙，二山，三华虫，四火，五宗彝，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叫九章。命数和章数对应。

三是职官制度。选拔官吏，注重德才兼备，试用后能胜任工作者，方可授予爵位和俸禄。考核官吏，一定要公平公正。主要官员及其职掌分别是：

冢宰根据每年的收成在年终编制预算，决定开支。

司空负责工程建设，安置百姓。对于中原民族和东南西北的少数民族，要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并且有翻译帮助他们交流思想、语言。翻译在东南西北方分别叫寄、象、狄鞮、译。

司徒掌管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礼和父子等人伦关系以及整齐饮食等级、衣服制度、工艺标准等八政。乡中德才兼备的学生推荐给司徒者叫选士，司徒将选士中出类拔萃者，即俊士推荐到大学，俊士又叫造士。选士、俊士不承担乡里和国家的徭役。

乐正（大乐正）主管国学教育，特别重视《诗》、《书》、《礼》、《乐》四门课程，并用它们作为教材培养人才。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司寇负责正定刑律，审查案件。

司会将年终的成绩总结后报告给天子进行考核。大乐正、大司寇、司市将部门成绩上报于司会，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也将各部门的年终考核成绩上报于天子，接受考核。

冢宰斋戒后协助天子考核政绩。百官斋戒后听候天子的考核评语。然后举行养老的宴会，举行蜡祭慰劳农夫。至此，一年事情算是结束，才可制定来年的施政纲领和经费预算。

四是巡守、祭祀、丧葬、田猎制度。天子每隔五年要到全国各地巡视一次。巡视之年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分别来到泰山、衡山、华山、恒山，巡视东南西北方。全国巡视完毕，用特牲礼到祖庙和父庙进行祭告。天子外出巡守、出征前，要先祭祀天、地和宗庙。

天子、诸侯、大夫、士分别设立有七庙、五庙、三庙、一庙。平民无庙。天子、诸侯的宗庙之祭，春、夏、秋、冬举行着者分别叫禘、禘、尝、烝。禘祭是特选一庙进行祭祀，禘、尝、烝祭都是将神主集合到太庙进行。天子祭祀社稷用牛、羊、豕三牲的大牢礼。

天子死后七日举行殡礼，七月举行葬礼。诸侯死后五日举行殡礼，五月举行葬礼。大夫、士、庶人死后三日举行殡礼，三月举行葬礼。三年之丧，自天子至庶人均不例外。

天子、诸侯在没有战争和凶丧之事的的情况下，每年春、秋、冬田猎三次，目的在于准备祭祀供品、招待宾客、丰富天子和诸侯的饮食品种。无事不田猎叫不敬，田猎时不守规矩叫暴殄天物。

五是养老制度、养老之礼。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分别用燕礼、飧礼、食礼，周人对三代礼斟酌取舍后兼而用之。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老人，分别可以参加在乡学、国中小学、国都大学举行的宴会，这种制度自天子到诸侯都实行。

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分别在上庠、东序、右学、东胶设宴款待国老——告老退休的卿大夫，分别在下庠、西序、左学、虞庠设宴款待庶老——告老退休的士和年老的平民。祭祀时，有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分别戴“皇”冠、“收”冠、“毳”冠和冕；养老时，分别穿深衣、燕衣、缟衣、玄衣。夏、殷、周举行养老宴会时，都要根据户籍核实参与者的年龄。

另外，还涉及到学校制度、朝聘制度等。天子允许，诸侯才可办学。小学设在王宫东南，大学设在郊外。天子、诸侯的大学分别叫辟雍、頖宫。诸侯对天子，每年要派大夫聘问一次，即小聘；三年要派卿聘问一次，即大聘；五年，诸侯要亲自朝见天子。

自“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以下，盖是后人记文窜入正文者，暂存而不论。

《荀子·王制》主要阐述如何治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成就帝王大业。具体做法是任用贤能的君子，

待之以礼，罢黜无德无能的小人，赏罚分明。即“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由此出发，荀子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以德治国，重视仁、义、威势，慈爱百姓，此乃王者之道。因此，荀子所讲的“王制”，是论述治国的策略，与《礼记·王制》记载的具体施政纲领有异。《荀子·正论》：“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职、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11]。”若以此为标准，则《礼记·王制》和《荀子·王制》所论，各有侧重，内容差异更大。

四、《王制》与《孟子》、《荀子》等文献之比较

《礼记·王制》的文字，《孟子》、《荀子》等书，多有征引。

第一、《公羊传》、《荀子》节引过《礼记·王制》中的文字。

1.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P. 385]。（《礼记·王制》）

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P. 2263]①}。（《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

2. 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P. 393]。（《礼记·王制》）
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P. 160]。（《荀子·王制》）

3.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明德^[P. 403]。（《礼记·王制》）

立太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导之也^[P. 499]。（《荀子·大略》）

4.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P. 412]。（《礼记·王制》）

王者之制：……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P. 159]。（《荀子·王制》）

沈文倬先生认为：《公羊传》是景帝时胡毋生“着于竹帛”^[P. 50]，《荀子》最迟完成于秦王政九年（前238）^[P. 51]。可见，《礼记·王制》之写定当在《荀子》成书前。

第二，《礼记·王制》记载周朝爵禄制度的一段文字和《孟子》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

《王制》曰：

王者之制爵禄，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P. 330-338]。

《孟子·万章章句下》云：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P. 2741]。”

《礼记·王制》关于周朝爵禄的记载和《孟子·万章章句下》的记载比较，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1、二者文字、意思几乎完全一致，《王制》更为精练，“上士倍中士”等句子只叙述一次；

① 《公羊传》和《孟子》文字均引自《十三经注疏》。

2、二者叙述周朝爵禄制度的顺序略有差异；

3、《王制》“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一句不见于《孟子》，明徐师曾认为是错简，当在下文“上士二十七人”下，甚是。

那么，二者究竟是谁抄谁呢？我们认为，在战国中期，可能就有专门记载周朝爵禄制度的文献在流传，《王制》、《孟子》均以其为根据。所以，《王制》在记录以周朝为主的爵禄、封国、祭祀、养老等制度时，引以为据。孟子看到的有关爵禄制度的记载，也可能只有此篇，故当北宫锜向孟子请教“周室班爵禄”时，孟子回答说：“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孟子也引用其文回答了北宫锜的问题。在《王制》和《孟子》之间，就上引文字而言，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祖本。当然也不排除孟子根据《王制》回答周霄问题的可能性。

周霄问孟子，古代君子三个月没有做官就去安慰，是不是太着急了？孟子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也。《礼》曰：‘惟士无田，则亦不祭。’”^[P. 2711]《王制》曰：“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P. 391]。”显然，孟子是根据《王制》回答问题的。这一材料似乎透露出《王制》的成篇早于《孟子》，当战国中期。^①

第三，《王制》记载的官职有冢宰、司空、司徒、小胥、大胥、小乐正、大乐正、司马、司寇、大史、司会、司市等，这些官职都见于《周礼》，但职掌没有《周礼》的记载清晰、系统，这只能说明《王制》写成于《周礼》前^[12]。

第四、孔子曾修纂六经，学术界颇有争论。《庄子·天下篇》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因是寓言，很多人不相信。郭店楚简《六德》曰：“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所讲六经次序与《庄子》全同，证明战国中叶实有这种说法。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这一点^[13]。其实，《天下篇》、《六德》中前四经次序与《王制》记载完全相同。《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P. 404]自汉以来，历代学者受卢植、郑玄等人的影响，一直将《王制》看作是汉文帝时期或战国末的作品，故没有引起重视。郭店楚简《六德》的发现，也从侧面证明了《王制》写成于战国中期。

第五、《王制》分为两部分，自“王者之制爵禄”至“其余六十亿亩”是第一部分，是《王制》原来的正文，类似“经”；“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是对前面正文的解释，即秦汉人所作之“故训”。任铭善先生、吕友仁先生^[14]已经指出，因此不能用后面的这些文字作为判断《王制》写成年代的根据。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谈相马的帛书《相马经》，赵逵夫先生曾撰《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发微》一文^[15]，指出该帛书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发千载之覆。而《礼记·王制》恰恰是流传下来的有“经”有“故训”的一篇文献。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时，《王制》之原文和“故训”可能已经抄写成一篇，故保存在《礼记》中流传了下来。

结论 廖平、康有为等人主张《礼记·王制》是孔子所作的观点，也缺乏证据。华友根先生曾撰文加以辩驳^[16]，再不赘述。根据以上的考察，我认为，《礼记·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以前的经文部分，大概写成于战国中期，与郭店楚简写作的年代相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以后，显然是秦汉人解释前面“经文”部分的文字，在刘向父子整理图书以前，《王制》原文和解释文字已经抄写在一起，成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樣子。至于《王制》原文和后面的文字分别是何人所作，文献缺乏，难以推知，姑存而不论。

先秦文献的写作和流传极为复杂，本文仅就《王制》的写作年代略作考察，恭请方家指教。

参考文献：

- [1] 王鐸. 三礼研究论著提要[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
- [2] 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朱彬. 礼记训纂[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 [3] 李学勤. 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J]. 古文献丛论[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 [4] 康有为. 考定王制经文序[J]. 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① 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见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页1—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今采用金景芳先生的观点，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智伯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线。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6] 郑玄、孔颖达. 礼记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7] 任铭善. 礼记目录后案[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2.
- [8] 钱玄、钱兴奇. 三礼辞典[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 [9] 沈文倬. 宗周礼乐文明考论[M].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 [10] 阮元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2] 钱穆. 周官著作时代考[J]. 燕京学报, 7.
- [13] 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整理标点本序[J]. 重写学术史[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14] 吕友仁、吕咏梅. 礼记全译[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 [15] 赵逵夫. 马王堆汉墓帛书《相马经·大光破章故训传》发微[J]. 文献, 1989(4). 古典文献论丛[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16] 华友根. 《礼记·王制》的著作年代及其思想影响[J]. 中华文史论丛, 1985(4).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The Study of The Scholars' Research *Wangzhi* o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Time When It Was Written

WANG 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viewpoints about the registrar and the time when it was written of *liji-Wangzhi* from the Han Dynas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Liao Ping, Kang Youwei etc. considered *Wangzhi* was Confucius' writing used to reform the government, so the scholars' sung high phrase to *Wangzhi*. From analyze the viewpoints of the scholars and the content of the *Wangzhi*, and compare it to *Mencius* and *Xunzi* etc., I think the lection of *Wangzhi* maybe written in the middl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s Guodian's Chu bamboo books' writing's time. Before Liu Xiang's time, the lection part and the interpretative words were already written together, this format comes down today.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Liji*; *Wangzhi*; the time when *Wangzhi* was written; Study and analyse

(上接第 37 页)

On the Research of the Thought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Yue Ji

ZHANG En-pu

(Literary Colleg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Li Ji is a classic book of Confucian school which includes a lot of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 thoughts of Confucian school, especially Yue Ji in it; it is the special paper explains the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 thoughts of Confucian school. The thoughts of literary critical theory thoughts of Confucian school are following: the thought of music sense and it is expressed that music of production is by person is moved by object, and otherwise it is expressed that the music has the function of sense object; the thought of Yue and Li and it is relation of Yue and Li, actually it is relation of literature and social moral. Yue Ji explain deeply the relation of Yue and Li. The thought of Yue rule and it is the rule of critiquing music, and it is also the rule of literature critiquing. The rule of critiquing music includes "He", "Zheng" and "Zhen".

Key words: Yue Ji; Literature critiquing; Thoughts; Research